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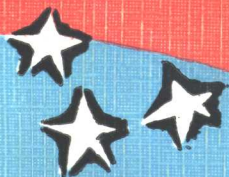
THE AGE 帝國主義時代

——美國對外政策的經濟學——

(美國)哈里·馬格多夫著 伍仞譯·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帝國主義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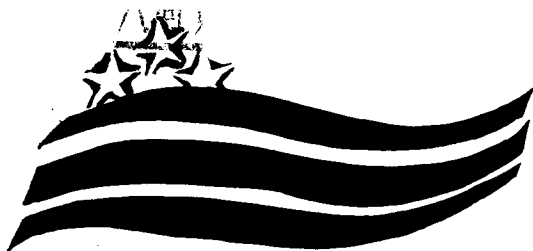
——美國對外政策的經濟學——

THE AGE OF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美)哈里·馬格多夫著

伍仞譯·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



帝國主義時代

——美國對外政策的經濟學——

(美)哈里·馬格多夫著 伍仞譯

出版者：香港朝陽出版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印刷者：大千印刷公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定價：港幣七元

一九七六年七月初版

出版說明

本書於一九六八年在紐約出版，作者哈里·馬格多夫是美國進步經濟學家、《每月評論》的主筆之一。書中闡述了有關美國對外政策的經濟問題，說明資本輸出比商品輸出更爲重要。他的論述和所整理的統計資料有助於說明最近幾十年來帝國主義發展中的一些新現象。這就是，國家壟斷資本和跨國公司大有發展，通貨膨脹更爲嚴重，舊殖民主義直接統治的制度已全面崩潰，新殖民主義的控制正在遭到抵制，兩個超級大國激烈爭奪世界霸權，三個世界已經形成，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瀕於垮台。國際關係中這些新的演變標誌了資本主義正在進一步沒落。

但本書有以下幾個主要缺點：○作者雖曾詳述金融寡頭和政權的結合，但未明確指出這種結合的實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他對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反對新殖民主義的鬥爭說得不够；○而且他在一九六八年寫這本書的時候還沒有看到美帝國主義的霸權已在衰落，他在此書出版後才寫了文章坦白地自我批評。

總的說來，本書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內容也比較豐富，對當前國際問題的研究頗有參考價值。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新帝國主義	三
第三章	金融體系	充
第四章	援助和貿易	一六
第五章	美帝國和美國經濟	一六
附件一		三三
附件二		三六

第一章 緒論

這裏提出的幾篇論文，是爲回答我在幾個大學講課時和課後學生們一再向我提出的一些問題而寫的。

許多學生由於對越南戰爭不斷升級的瘋狂、無理性和恐怖感到迷惑不解，開始探索其原因：越南戰爭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總的和一貫的計劃的一部份呢，還是一羣特殊的當權人物偏離正軌的行爲呢？

提問的學生們撇開那些關於更高的道德和對國家安全的威脅等宣傳性論點，想要尋求隱藏的動機。有些人以爲，或許南越有極其重要的原料和特殊的商業機會，由此可以說明美國政府爲什麼那麼強烈地和一意孤行地推行其鹵莽的征服路線。由於在這方面找不出明確的或完滿的答案，有些人就企圖對東南亞的形勢進行比較全面的估價。他們作出這樣的假設，認爲越南戰爭是由以下幾個因素構成的美國總的戰略的一部份：

(1) 美國力求控制和影響整個東南亞，這個區域有二億以上的人口和一百五十萬平方英里的土地。這裏的市場和原料資源（潛在的和現有的），不僅對美國是重要的，而且對可以充當美帝的小伙伴的工業化的日本也是重要的。

(2) 軍事上決定在南越建立強大而可靠的基地，以便儲存大量裝備和補給並屯駐兵力。

(3) 使用這樣一個在海岸綫上或靠近海岸並接近北越的軍事基地，作為一種力量源泉，不僅可用來控制和影響整個東南亞，而且可用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包圍圈的一部份。在一旦發生對亞洲共產黨國家的陸上戰爭時，這個基地不僅會起到威脅的作用，而且可以用作軍事活動的區域。

這種結合冷戰的歷史來考慮的思想方式，使比較老練的人們在更為廣泛的範圍內提出問題：難道美國政策的根本原因或許要在現代帝國主義、在擴張主義制度的資本主義中才可以找到？但是這裏他們又有一個難題。帝國主義這個假設似乎和一般公認的觀點相衝突，這種觀點認為在整個美國經濟中，輸出和對外投資是一些次要成分。^①如何解決這一明顯的矛盾呢？

現有的經濟文獻不能提供很大幫助。不錯，近幾年來經濟學家更加注意國際經濟事務，特別是在諸如國際收支、黃金、對外援助、國際貿易等事項以及不發達國家的問題上。然而，除了在主要與實際業務有關的國際商業投資的法律和行政方面的文獻逐漸增多外，在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之間的關係方面，則很少有人進行研究。經濟理論家們通常都避開將美國作為一個國際經濟力量來進行分析，或者將美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份進行研究。

迴避這一問題的突出的例子可以從約翰·加爾布雷思的主要著作《新工業國家》中看出。在

^① 並不是說次要的經濟影響應該被忽視。限界經濟力量有時能有格外的特殊重量——如人們能夠在例如羅伯特·恩格勒的《石油政治》（一九六七年，紐約版）中容易地看到的。對整個經濟來說是限界的經濟效用，對某些大公司來說可能是主要的。因此，它們能對公共政策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因為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這些公司手中。

這本書裏，作者大胆地企圖別開生面並排除公認的正統學說的障礙而達到新的理論概括。由於他的分析的中心點是由大公司控制的美國這一概念，他一再強調大公司在經濟和政治事務上的戰略影響以及它們爲了自身的安全和保障而控制其原料資源和市場的迫切需要。然而，從加爾布雷思這本書中無法知道這些大公司具有任何國外的經濟利益，儘管事實是，如下述文件所示，國外的原料資源和爲了銷售其產品的國外市場，是這些大公司業務活動的重要的和日益增長的構成部份。關於這個方面不僅在加爾布雷思處理大公司問題時被忽視掉，而且在他討論大公司利益和對外軍事政策的關係時也被忽視。關於後一點，他強調了軍費開支對大公司的成長和安全上的戰略作用。但是人們找不到一句話是有關大公司的國外捲入的，雖則作者圍繞着公司控制原料和市場的迫切需要而建立起來的理論結構要求作這樣一種分析。

學生們關於一個「孤立主義的」經濟和一個積極的國際外交政策之間的反常狀態反覆提出的問題，反映出正統學者們，或甚至自由主義的和激進的社會批評家們，都缺乏這方面的研究。所提問題的重要性和這方面的學術上的空白，促使我作了在這裏發表的一些研究。我被邀請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在紐約舉行的第二次社會主義學者會議上提出一篇關於帝國主義的論文，這就給了我公開提出爲回答這一問題所作研究的最初成果的機會。（發表在《每月評論》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號上的這篇論文的修正本重印在本書裏作爲第五章。）

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搜集並估價充分的事實來檢驗這一幾乎普遍流行的說法，即對外經濟活動在美國的商業利益中是一個很小的、甚至是很不重要的成分。這些事實表明什麼呢？照我看來，回答是明確的：普遍流行的說法是錯誤的。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到對外投資

的效果，沒有理解到儘管直接投資形式（在礦山、油井和製造業方面）的資本輸出比任何一個年份的商品輸出少得多，但逐年投資的累積的效果所產生的經濟捲入則遠遠大於商品輸出。

當人們像慣常那樣只考慮一個年度的商品和資本輸出的數量，對外投資的累積的效果就被忽視了。和資本輸出相比較，商品輸出僅僅表示一種流出；商人力求保持和增加美國國內工廠產品的這種流出。每年必須更新這種流出；去年的對國外的流出屬於過去，必須為今年的產品尋求新的銷路。

對比之下，移向國外的投資則建立起一種投資的儲備。在國外工廠和設備上的投資永遠留在國外，除非整個企業最終被賣出或被沒收，或者像採礦那樣，直到自然資源最後枯竭。但是只要國外有商業投資存在，並有銷售其產品的市場，投資是會永遠自行存續下去的。產品出售的價格，除利潤和支付工資與原料的費用以外，還包括資本的貶值（或準備金的減少）。這樣，資金不斷地產生出來，不僅為獲得「永恒的」利潤，而且也為了「永恒的」更新陳舊設備和（或）開發新的礦源。每一項流往國外的新投資自然都要加進「永久的」投資儲備之中。

一個簡單的算術圖表可以幫助說明這一點。假定美國各大公司每年投資國外五十億美元。又假定每五十億美元的投資可以合理地預期一百億美元的產品（或每年用在工廠和設備上的最初投資一美元生產出兩美元的產品）。我們就會得出下述結果：

年 度	每年投資國外 的資本流出	每年年終國外資 本的累積儲備 (單位：億美元)	使用資本設備而 產生的每年產品
一	50	50	100
二	50	100	100



這樣，第一年的投資產生五十億美元的儲備，從這項儲備每年有一百億美元的產品可供銷售。在第二年，有另外的五十億美元的流入加進前一年的投資中。那麼就有了一百億美元的累積儲備。這就是每年能生產二百億美元新產品的工廠和設備。到第十年，累積的儲備達到五百億美元的投資，而每年可以供應市場的產品則達一千億美元。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人們談論的是每年流出國外的數量比較小的投資，他們就會看不到這種投資活動的累積效果的充分意義。如果人們只看每一個年度的商品和資本輸出的數量，他們就會忽視美國在國外的商業活動的全部效力。假定美國一年的商品輸出達二百五十億美元，並將它同十年的對外投資（按每年五十億美元的比率）的結果相比較，正如我們的圖表所表明的：由累積的投資儲備所產生的一年的國外商業活動數量達到一千億美元，也就是商品輸出的四倍。

觀察美國對外商業活動的這種方法，為我們對美國對外經濟捲入範圍的理解增添了一個新的方面，同時它提供了一種結構用來考察因這些投資而產生的大量對外銷售、投資和利潤的流入所帶來的問題。

然而我們的興趣並不僅僅在於對外經濟捲入的大小，也有必要問一問這些活動對國內經濟是

如何重要。如果我們按照一項算術比率來思考，我們能够知道到現在爲止我們所討論的只是分子。我們用來作分母的是什麼呢？在這裏我們又遇到關於這些問題的一般公認的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一個普遍的缺點。衡量經濟事務中的重要性的慣用方法，是將考察中的各個可變量同國民生產總值相比較。如果一個特定經濟部門够上了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個大的比例，事實上它就被認爲是重要的。反之，如果它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小，則被衡量的這個特定項目通常就被認爲是不重要的。

這類統計上的檢查的弱點，就是它不區分戰略的和非戰略的經濟部門，不區分從屬的和獨立的可變量，不區分創造剩餘產品的各項活動和對剩餘產品的利用有關的各項活動。這裏只要注意到以下一點就够了，即所用的探討問題的方式限於評價對外經濟活動的相對重要性的基礎，從而並把這種經濟活動同可比較的國內經濟部門聯系起來。此外，還特別重視生產資料工業之類的戰略部門，它們在商業周期性方面是最不穩定的成分。

對可獲得的事實所作的分析表明，一方面旨在控制（直接地或間接地）盡可能多的地區的美國的積極的對外政策和另一方面美國商業的强有力的國際擴張政策之間，存在着一種密切的聯系。指明這種聯系的存在，當然並不證明它們之間有因果關係。它所指明的是，認爲美國經濟是「孤立主義的」這種看法完全是錯誤的，同時可以由此得出結論，美國國際經濟事務的擴張，在任何企圖說明現今世界情況的假設中，都必須作爲一項重要考慮。

爲了理解主要的過去趨勢和潛在的將來趨勢，我們需要從大量的可變量中找出較爲重要的影

響。然而，企圖達到一項簡單的、單一原因的公式，多半就會束縛我們認識的提高。關於帝國主義這個問題，在一個極端就有這樣一些理論家：他們指望用某種人類本性中的普遍性質或者某種社會遺傳來把現象解釋為歷史上的一種不斷的和經常的力量。例如，有資格的經濟歷史學家戴維·蘭德斯教授就這樣說明：

「在我看來，我們必須把帝國主義看做是對僅僅由於力量的差距而產生的共同機會的各種各樣的反應。凡存在這種力量差距的時候和地方，人們或集團就會利用它來謀取私利。我們遺憾地注意到，人類獸性的本性就是排擠別人——或拯救他們的靈魂或『教化』他們，依情況而定。」^①

這一解釋，不管正確與否，它是那樣高度的抽象，無助於理解侵略和擴張的類型與目的所具有的歷史的不同點。比方說，它絲毫不能說明歷史上資本主義擴張成為一個世界體系，也不能說明這種擴張為什麼同少數非常富的國家和多數仍然窮的國家之間日益增長的力量差距聯系在一起。

在過度簡單化分析的另一極端，就是「純粹」經濟帝國主義公式。尋求對外政策決策的真實的經濟動機，在多數場合可以作為一項有用的假設。但是如果人們期望找到能對每一個和所有的政治和軍事政策的行動都有用的這樣一種假設，這個方法又將失敗。

① 戴維·蘭德斯，《經濟帝國主義的本質》，載《經濟史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號，第五一〇頁。

這種概略的假設所以行不通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軍事政策和政治政策不是建立在嚴格的成本核算的法則之上的。公司的確需要針對在適當時間內收回資金並獲取利潤的前景，仔細衡量資金的每一項支出。政府則不受這種預算上的考慮的限制；政府可以徵稅，印製鈔票和發行公債。政府開支當然也是有限度的，但政府開支來自國家的整個經濟資源，而不是來自某一公司或公司集團的資源。

政府用錢的正當合理，不像公司那樣要嚴格衡量成本和利潤，雖然有些政府可能想要顯得它們是這樣衡量的。一個政府爲了控制一個生產香蕉的國家，它會花費成十億的錢（從全國人民徵收來的稅收），儘管從而取得的控制只是保護了一兩個公司的成百萬的利潤。但帝國主義的現實遠遠超越這個或那個投資者的直接利益；其基本目的無非就是要保持盡可能多的世界地區對巨大的多國公司的貿易和投資開放。在不同國家商業組織之間有爭奪利益的地方，每一政府的政策的目的，就是繼續擴大其對外影響。控制的程度大小將會有所不同，從軍事佔領到非正式的勢力範圍等手法，按照情況和政治軍事領導人對什麼是在該情況下最現實的手段所作的判斷來決定。

當所有這些因素都加以考慮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企圖用簿記的用語來解釋各個孤立的行動，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生產利潤並不很大的拉丁美洲小國，對美國政策的制定是重要的，因爲美國對整個拉丁美洲的控制是重要的。在這裏，控制和影響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爲了防止美國資本被沒收和使那個國家不發生社會革命，而且還因爲這些國家在聯合國或美洲國家組織中的投票權對建立美國霸權的總計劃也是重要的。這樣地來了解以後，在越南的屠殺和破壞以及巨額金錢的花費，在美國決策人的心目中，就不是用在越南可以獲得利潤的商業機會來衡量的，寧可說

它們是按照軍事和政治領導人關於下述問題所作判斷來衡量的：得採取哪些必要措施來控制和影響亞洲，特別是東南亞，以便將這整個區域一般地說留在帝國主義體系之內，具體地說留在美國勢力範圍之內呢？

接近經濟帝國主義概念（在有限制的收支平衡表意義上）的同樣類型的想法，通常也把這一句語限用於一個工業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控制（直接的或間接的）。這樣的限制無視了產生於十九世紀末期的新帝國主義的根本特點：工業國家爲追求對世界市場和原料資源的統治地位而進行的競爭性的鬥爭。

新老帝國主義的結構上的區別，就在於一種由許多公司相競爭的經濟被一種由每一工業部門中少數大公司相競爭的經濟所代替。此外，在此時期中，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和比較新的工業國家對英國的挑戰，給帝國主義階段帶來另外兩個特點：在世界舞台上競爭鬥爭的強化 and 一個真正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成熟。在這種情況下，大公司集團之間以及它們的政府之間的競爭遍及全球；既在半工業化和非工業化國家的市場進行，也在先進國家的市場進行。工業國家爲取得對經濟上落後地區的殖民統治和非正式控制而角逐權力的鬥爭，不過是這種經濟戰的一個方面，並且僅僅是新帝國主義的標誌之一。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各國，其力量和獨立性有程度上的不同，爲權力和控制而進行的勾心鬥角則遍及整個體系——在小國之間是這樣，在大國之間也是這樣；在比較窮的國家之間是這樣，在比較富的國家之間也是這樣。把帝國主義局限於僅僅是在不發達世界的行動，那確是很奇

怪的，如果我們考慮到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對歐洲其他國家所抱目的的一貫性的話，德國的綱領就是重新組織和控制非工業化以及工業化國家來爲不斷擴張的德國資本主義的需要服務。

近來常有人說，和美國在不發達國家中的投資相比，美國資本在西歐的更大的捲入，是美國背離帝國主義的證據。這種見解當然是站不住腳的，如果人們認識到不平衡發展的工業中心之間的對抗是帝國主義車輪的軸心的話。

但還應從另一角度來看美國資本在其他先進國家中的擴張。西歐較高的生活水平和積累起來的巨額資本，來源於這些國家過去和現在通過對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國家的剝削得來的利益。滲透到歐洲各宗主國，美國資本可撈取到一部份油水；從（1）西歐的廣大消費市場和（2）通過由這些宗主國在與其附屬國的關係中發展起來的渠道進行貿易的機會，美國資本都可以得到好處。在這裏我們用海盜時代作個類比也許有些幫助，那時有些企業家靠掠取遠離宗主國的海島和海岸上的財富爲生。那末，讓我們設想有個企業家，爲了搶劫駛回其本國的海盜船而裝備了一艘船。這一企業上的投資是否比原先海盜的投資更少依賴於海盜行徑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注意到，美國石油工業在西歐的大批投資（見第二章，表十三），依靠提煉和銷售從中東進口的石油而獲得其利潤。

對經濟帝國主義理論的誇大，並不限於該理論的擁護者。對經濟帝國主義作機械論分析的更爲可笑的說法可以在批評家的著作中找到。一個突出的例子見於馬克·布勞格教授所寫的一篇論文《再談經濟帝國主義》中。其中，布勞格教授提出了他認爲能對這種說法給以毀滅性反駁的論據，這種說法認爲資本輸出的誘因是國外有更大的利潤機會。論據如下：

「更爲突出的是，和在拉丁美洲的百分之十一、在加拿大的百分之八相比，對外投資利潤率在波斯灣高達百分之二十；但是波斯灣吸引了美國對外投資不到十分之一，而戰後年代對外投資的增長率在加拿大却高於在盛產石油的中東地區。」^①

在這裏我們看到這個公式的心理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不管表面現象如何，這種論點和商業行爲的現實却毫無相似之處。在波斯灣石油投資利潤高這一事實，並不意味着追加的投資單位就會產生同等的利潤。某一特定油源一旦被掘開並有了最有效的油井裝置，進一步的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就是很有限的（除了爲排除競爭者控制石油礦藏所作的投資外）。在達到某一點以後，追加的投資不會產生所希望的利潤率。像在石油工業那樣，當石油租借的所有權高度集中時，對進一步投資的這種限制就特別明顯。這種商業上的基本考慮適用於許多情況。例如，一旦建成一條鐵路綫，吸收着兩點之間全部貨運和客運，則增加綫路將是無益的，不管最初的投資有多大的利潤。

布勞格教授更感興趣的顯然是在否認帝國主義的存在，而不是試圖理解它的本質。如果他有興趣探討他所引事實的意義，他就會向自己提出這樣一些問題：爲什麼在波斯灣除石油外就沒有其他重要的可以獲取利潤的機會呢？爲什麼能够生產這樣巨大利潤的地區就沒有足夠大的消費市場來支持其他可以獲取利潤的投資呢？

① 馬克·布勞格，《再談經濟帝國主義》，載《耶魯評論》，一九六一年春季號，第三四三頁。

通過使用未經消化或未經分析的事實而進行歪曲的另一個例子，可以在巴巴拉·沃德所著《西方世界在絕境中》一書的題為「美國是帝國主義嗎？」的一章中看到。在爲了反駁認爲美國是帝國主義的這種看法而提出的理由中，沃德女士寫道：「在過去，美國人並沒有謀求用征服新的國外市場的方法來打開國內的經濟僵局。恰恰相反，他們把對外貸款和對外貿易減少到最低限度。」^①

這第一句話當然是完全錯誤的並且是和美國經濟史的全部過程相矛盾的。^②但沃德女士還是提出了支持她的論點的數據。這就是她所提出的：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蕭條年代中，商品輸出從五十二億美元下降到十六億美元，對外貸款從二十七億美元下降到四億美元。

但是的確這些數據並不給美國「把對外貸款和對外貿易減少到最低限度」的主張提供充分證據。對外貿易和投資的減少並不是自願的。美國爲恢復對外貿易有力地進行了反措施，但面對蕭條的嚴酷性，這些反措施是無能爲力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的現實是國際貿易的總崩潰，無論是資本家或是政府都不能防止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失敗。對外貸款的減縮是因爲可靠的借主很少：那些年裏有二百二十億美元以上的對外公債拖欠不還。同樣，也不存在保持——更不用說增加——輸出貿易的基礎。除非找到了擁有爲購買所需要的支付手段的外國買主，商人是不會輸出的。在一個因國際支付制度的瓦解而複雜化的世界範圍的蕭條時期，根本不會有這樣的買主。

① 巴巴拉·沃德，《西方世界在絕境中》，一九四八年，紐約，第一三六頁。

② 可參看例如威廉·阿普爾曼·威廉斯，《美國外交的悲劇》，一九六二年，紐約。